

非遗如何在T台上焕发光彩



□ 杨红

在刚刚落幕的中国国际时装周(2019春夏系列)的T台上,身着香云纱裤装的模特翩翩走来,让人不禁想起张爱玲笔下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的“睨儿”,民国时期就备受女子喜爱的香云纱在这一季的时装周上轮番登场。香云纱在当代人眼中不再沉闷、老气,而成为优雅、知性和环保的代名词。

继2008年“香云纱染整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年间,经过生产性保护、创新性发展,香云纱在传统工艺振兴的当代实践中逐渐成为时尚潮流。

传统形成时尚

在当代,时尚领域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力巨大,尤其是年轻人,紧随潮流而动,因而,T台也是我们弘扬和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除了香云纱这一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的丝绸面料,蓝印花布、艾德莱斯绸、亮布、夏布、织锦等传统面料近年来在各类时尚场合轮番出现,成为各类创意活动的主角。比如,苏州市吴江区“丝绸名镇”盛泽在本次时装周举办了“绸都盛泽风尚秀”,而重庆市荣昌夏布已经是第二次登陆时装周。因而,富含中国特色的纺织面料也需要通过时装周等平台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设计师和品牌的关注,让其形成更广泛范围的流行。

在纪录片《服装里的中国》第二季中,与服装相关的传统工艺以纪录短片的形式呈现,其中就包括对香云纱染整工艺的介绍。这类普及传播能够让国内外的内容生产者、产品生产者广泛认知此类资源。与此同时,文化传播也为相关产品、服务及品牌创造了与众不同的无形价值。比如,香云纱复杂的制作工序、环保的染色原理,以及其中包含的哲学、科学与美学意义……都是向大众传递香云纱制成品价值的有效触点。

传统再造时尚

非遗、传统手工艺、民族民间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已然成为时尚产业的创意源泉和核心卖点,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对传统文化的“解码”越深度,发掘到的当代价值越大,越能碰撞产生“最中国”的时尚潮流。

这次时装周,我们看到了依文·中国手工坊这样平台化推广中国传统手工艺的T台常客,也看到了阿牛阿呷这样直接从事非遗传承创新的从业者,将本民族本地域代表性工艺技艺带上T台。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企



模特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周“荣昌夏布·张义超创意作品发布会”上展示时装作品。 陈建力摄

业、设计师加入创造性运用非遗等传统文化资源的队伍,并已然从传承传统中受益,“解码传统,再造时尚”集群效应正在形成。

当代设计师的“匠心”在哪里?灵感、混搭、跨界……创新路上不变的是对传统的礼敬,对资源的有序利用,符号、物料、工艺中所包含的思想理念和审美风范不能丢失。真正能够解码传统的设计师,也是当代“工匠精神”的代表。

时尚青睐传统

2017年11月发布的《中国纺织非遗可持续发展千岛湖宣言》中讲道:作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主要消费

品,纺织服装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纺织类非遗富含的个性化、自然化、人性化特点,正好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消费观念的转变方向不谋而合。比如,当代人对取之于自然、可分解回归自然的天然物料、染料的推崇。而香云纱恰好与此不谋而合,只采用天然植物薯莨的汁液和含有高价铁离子的河涌泥染色,不含任何化学助剂。这类先民智慧、本土知识在纺织类非遗中比比皆是,使得传承传统渐成当代时尚消费的风向标。

无论是高级定制,还是更接近日用消费的成衣、快时尚,都可以从非遗等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时尚的答案。并且不止于服装,配饰、潮鞋、文创日用等都是传统元素创新的板块,能产生更为突出的市场表现和潮流影响力。

用技艺传承文明

——读《中国守艺人一〇八匠》

□ 秦延安

传统手工艺带来的不仅是多彩的世界,还维系着国家和民族几千年来沉淀的诗意与乡愁

中国传统手工艺,以独具匠心的深邃文化和美轮美奂的精湛技艺,传承着悠远的中华文明。为了助力中国传统手工艺传承,资深广告创意人罗易成历时两年完成《中国守艺人一〇八匠》,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了108位以倔强精神守护传统手工艺的工匠,让我们在体味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同时,认识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匠心伟大。

中国传统手工艺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技艺精湛,科学技术和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其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灿烂多彩的物质文明是由众多传统手工艺创造的。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大量优秀、珍贵的传统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为了使这些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艺得到更广泛的认知,2015年,罗易成萌生了去全国各地走访记录有当地特色和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和手工艺人的想法,并通过自己广告传播的经验,使这些民间手工艺的魅力与意义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于是,便有了《中国守艺人一〇八匠》。该书介绍了108位中国传统手工艺人及其承载的手工艺,在展现传统手工艺之美的同时,细腻、真挚地描绘了他们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态度、沉静而朴实的快乐与生活,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纯粹的精神之美。

手工艺是一种用创意打扮人们生活的文化。中国传统手工艺经由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获得穿越历史的生命力,成为仍具活性与温度的文化符号。在书中,伴随300余幅精美图片,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物件在艺人手中经历的一道道工序:削切、剪裁;熔铸、锤炼;打磨、镶嵌;印染、装裱……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延续着技艺,融会了巧思,凝结着愿望,拥有了灵魂。手与技艺,如胶似漆。从一开始,从一而终,日复一日地演绎着擅长。木版水印传承人北京荣宝斋的赵慧萍,4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最拿手的题材便是徐悲鸿的马,是根据水墨渗透原理表现笔触墨韵的传统版画印刷技艺。“咱们国画的特点是墨色完全渗透在纸的背后,因为宣纸本身就是手工抄制的,国画的这种层次感、立体感、颜色的深浅浓淡在纸上反映出来的效果,是任何一种印刷都达不到的。”只有木版水印能达到中国水墨淋漓的艺术效果。无所力致的精湛技术,让我们不仅佩服老祖宗的聪明才智,更是感叹中华文化的深厚。

中国传统手工艺是中华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传统手工艺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种工艺,还有一颗匠心。这种宝贵的精神内核,也是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以及世俗名利裹挟之下所缺乏的人生判断与价值定见。作者表示,通过传统手工艺,可以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让人们相信匠心能让人生变得纯粹而笃定。山西上党女红传承人高艳青,坚持缝制布老虎,不仅是为孩子们祈福,更是缘于一位重病在床的山西籍同胞,看到布老虎病情得到好转。对于离开了家乡的游子,一些手工艺也许就成了那些心里无根的人最大的寄托和念想。手制书传承人张晚栋,坦承自己做手制书不仅是因为其稀缺,还“希望阅读可以慢下来、静下来”,“希望生活的节奏可以慢一点儿,让我们多一些时间驻足和回望”……从手艺人的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手工艺是我国一切文化艺术的源头和根基,更能体味到原来我们苦苦寻找的人生真谛,就在于传统文化中。

哲学家罗素说过,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传统手工艺带来的不仅是多彩的世界,还维系着国家和民族几千年来沉淀的诗意与乡愁。而像罗士一样的“守艺人”,用匠心守护的不仅是一种技艺,还有技艺传承的中华文明。



惊艳遂川“六古砚”

□ 谢路明 刘祖刚



清水水荷莲纹端砚

状,砚台中心稍内凹,一侧有砚池,砚池周边施有蕉叶纹饰。此器带有砚盒。1993年,两砚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清心形龙纹青石砚,石制,直径26.32厘米,缘厚2.10厘米,重2.160千克。砚台呈桃形,内凹,砚台边缘为龙纹,底部人为阴刻“清故先妣庶母”“乾隆四十一年”。2004年,由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民国双龙戏珠椭圆形砚,石制,宽径28.26厘米,窄径21.59厘米,厚4.46厘米,重量2.240千克。砚为椭圆形,砚周呈浅花瓣状,砚池置于砚台的一侧呈椭圆形,另一侧饰双龙戏珠图案,龙周及池两端饰水波纹,尾端略凹可作洗笔池,底部平面工整,整个器形美观大方。1990年,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三级文物。

熟悉砚文化的朋友都知道,上等砚台的价值一方面取决于砚石的品位和雕琢工艺所体现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取决于该砚石所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砚石的品位来看,该馆收藏的六古砚中的清水水荷莲纹端砚、清卵石纹端砚、清蕉叶纹端砚皆为上品端砚石所造,手抚之有清凉透指尖之感,呵气顷刻凝露润湿,天然的石品、纹理非人工巧饰之所能。端砚石出产在广东省肇庆市东部的烂柯山和肇庆市七星岩北面的北岭山一带,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驰名于世,具有发墨快、不损笔、不易于干涸和易于洗涤的优点。古人盛赞其石有“呵气研墨”之说。

从雕琢工艺所体现的艺术价值来看,遂川博物馆收藏的六古砚的雕琢工艺水平皆为古代工匠精心之作,所雕琢的图案繁复且精细,多有吉祥的寓意,尤其以清水水荷莲纹端砚和民国双龙戏珠椭圆形砚的雕琢工艺为佳。两砚描绘的莲中鱼儿戏水和双龙夺珠之态活灵活现,显示了高超的石雕技巧。

那么,读者禁不住要发问:为什么名贵一时的砚台,在遂川县清代出现如此之多?为此笔者翻阅《龙泉县志》《遂川县志》《江西方志》等资料,进行认真思考。笔者认为以下因素,是这些古砚背后的深刻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其一,清代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朝代,也是我国砚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制砚业也达到空前的繁荣。清

代制砚工艺中的造型、构图、雕刻手法等均集古今之大成,超越历代传统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馆收藏的六古砚中的鱼莲等图案,达到一种沉稳精练、端庄敦厚的艺术高度,充分说明清代制砚水平。清心形龙纹青石砚还留有“清故先妣庶母”“乾隆四十一年”的刻款,这也是清代制砚中常见的特征。

其二,从宋至清,遂川县参加科举的士人阶层不断扩大,人数日趋庞大。遂川古称龙泉,这片土地自古“序庠相望,弦诵相闻”,素有“文献名邦”之誉。据《遂川县志》所记载,“……经科举取士,从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止,见于记载的有文进士71人,武进士5人;文举422人,武举143人”,从已中举的士人可反推士人阶层规模之大。砚作为文房四宝之首,其客观需求量与士人阶层的人数是呈正比的。

其三,自宋以降,特别是到了清代,遂川文教之风蔚然,各类书院不断涌现,培育了一大批笔墨传家的文人、宗族势力。据《遂川县志》所记载:“自宋至清,遂川先后建有书院40所,其中宋代6所、明代2所、清代32所。”至今仍有著名的燕山书院、新兴书院、八角楼书院、五华书院、五峰书院等书院留传后世。砚文化是书院文化、文人文化的自然衍生延伸,遂川文教之风的兴盛,也意味着砚文化的长盛不衰。古代文人终身与砚相伴,视砚为知己,砚文化蕴含了文人的身份认同和细腻文化心理。一副上品好砚既是士人身份的象征,也是文人交游酬答的文化媒介。正如北宋唐庚的《古砚铭序》说:“砚与笔墨出处相近,寿夭不相近也。笔之寿以日计,墨之寿以月计,砚之寿以世计。其厚也。笔最锐,墨次之,砚钝者也。岂非钝者寿而锐者夭乎?其用也,笔最动,墨次之,砚静者也。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吾于是得养生焉。”这种对砚台的推崇备至,生动地折射了文人的身份认同和细腻文化心理。

其四,明清以来,江右商帮(赣商)崛起,遂川经营木材等生意的儒商家族日益兴旺,经济文化实力都相当雄厚。遂川地处赣南,盛产粮食、茶叶、竹木等物产,竹木资源特别丰富。仅清乾隆《龙泉县志》记载的常见竹木树种就有34种,新中国成立后大致查明全县乡土树种110余种,1300多种,引进树种17科60种。明清以来,遂川杉木畅销全国,简便易用的木材测量方法“龙泉码”即因此而创。因经销木材而富足的家族在当地比比皆是。比如著名的堆子前镇鄢溪村黄氏家族,因经销木材而富足,其为长久振兴计,进而创办燕山书院,成为一时之美谈。

这些儒商家族“出则为商,入则攻读”,因商而富,又凭科举而贵。科举功名带来的种种特权、地位,守住了几代人的财富。所以,儒商家族对于科举功名十分渴求,愿意在家族文化教育的振兴上花费巨资。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远在广东省肇庆市出产的端砚石制作而成的名砚,能够大量发现在遂川的土地上。

